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

罗常培 蔡美彪 编著

增訂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下祀先賢先師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照依

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照依

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民毋得於內安

或聚集理問詞訟繫瀆飲宴工役造作收

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諸人毋

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司朔望祭祀

師生廩饒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

支米糧優卹養贍廟宇損壞隨即修完

帛培 蔡美彪 编著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

增—訂—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罗常培,蔡美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ISBN 7-5004-4275-0

I. 八… II. ①罗…②蔡… III. ①八思巴字—研究②汉语—研究—
元代 IV. ①H212②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604 号

特约编辑 张瑶均

责任编辑 张小颀

责任校对 李云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松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图 版 70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增订本说明

本书初版由科学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书名《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题注“资料汇编”,分为一、二两编。现在增订再版,补成四编,题注改为“增订本”以示区别。

本书原来的编辑宗旨是:整理刊布一批新获的八思巴字汉语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在龙果夫的研究基础上,对元代汉语作进一步的研究。原曾分为四编:一,绪论;二,资料;三,音韵;四,字汇。初稿完成后,1952年即开始付印,并请马叙伦先生题写了书名。编校过程中,常培先生感到,他所写的音韵部分,有再加斟酌的必要,准备作些修改和补充,但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拖了几年,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1958年,常培先生心脏病不时发作,一再住院治疗,遵医嘱已不宜再做繁重的研究工作,于是毅然决定:将已排印校样的第三编音韵部分撤出,第一、二两编作为资料汇编出版。原附于第三编的龙果夫论文的译文,题为《八思巴字与古汉语》,作为单行本印行。字汇部分存以备考。常培先生的这些果断的决定,显示他治学的谨严和持论的慎重,使我深受教育。遗憾的是,常培先生在为本书写了前言的几个月之后,即不幸病逝,仍未能见到此书的出版。

常培先生逝世后的次年,《中国语文》杂志曾把他所写的音韵一节的校样,请陆志韦先生校订,题为《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在1959年11月号发表。陆先生写了“编者校语”。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已近四十个年头。

本书现在得到再版的机会。我依据罗圣仪女士保存的常培先生遗稿和我手边的存稿,酌加整理修订,仍按原计划增补为四编,以实现当年的初衷。现将增订情况分编说明如下:

第一编绪论。只作了文字上的删略和修订,没有增补新的内容。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文物,近年来陆续发现甚多。本编第三节旨在举例说明八思巴字应用情况,不再作新的补充。

第二编资料。碑刻部分未作变动。碑目文字,间有修改。

《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原只收录元顺帝至元刊本与日本复刻泰定本影印,现补入元至顺刊本与元刊别本的影印本。现存四种元刊本遂得全部录入,可供比照

研考。

清抄本《蒙古字韵》原据罗常培先生所藏 1938 年于道泉先生拍摄本影抄，补入了缺页。

罗常培先生在本书编校过程中，曾对《蒙古字韵》重新校勘。现据手稿整理刊布，以使这一遗稿得以传世。

第三编音韵。第一节字母，据原校样修订。

第二节音韵，据《中国语文》所刊常培先生遗稿。陆志韦先生所写“编者校语”一并录入，以明原委。

第三节，唐虞译罗常培校订的龙果夫论文，依原计划据单印本收录。用原著标题“八思巴字与古官话”。

第四编字汇，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依据本书所收碑刻和百家姓等资料编制的。初版未及刊布。现据原稿整理修订，仍编入第四编，以供参考。

经过上述的整理和增订，本书大体上恢复了常培先生原来的构想，算是履行了他的遗志。对我来说，也算是对四十五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做了个小结。常培先生过早逝世，未能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是无可弥补的遗憾。

本书出版以来，海内外学者关于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的研究，已取得不少的进展。李盖特、杨耐思、尾崎雄二郎、郑再发、中野美代子、桥本万太郎、照那斯图、宁忌浮等先生，分别对元代汉语音韵的研究和八思巴字资料的整理校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本书的增订曾从中获得不少的助益和启示。但增订本基本上还是依据原来的构想和原有的工作成果，对诸家新著未及一一引录介绍，请予鉴谅。增订工作中的疏失和不妥之处，还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蔡美彪

2003 年 3 月

初版前言

八思巴字是元朝八思巴喇嘛仿照西藏字体所造的一种蒙古字。当创造这种字的时候,蒙古的统治者本想拿它替代在这以前用来书写蒙语的古畏兀字,但是从至元六年(1269)颁行以后,直到元朝灭亡,它只是用在当时的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各种东西上,始终没能彻底地普遍地推行。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现在不单还保存着很多用八思巴字写蒙语的资料,而且元代历朝八思巴字对译汉语的资料也保存得非常丰富。这些对于研究蒙古史,古蒙语和汉语史都是很有用处的。应用八思巴字对译汉语的资料可以研究元代汉语的音韵系统,并可以从而推求它和汉语普通话在发展过程上的关系。

本书是一部八思巴字对译汉语资料的汇编。前面的绪论只是综合一些材料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对八思巴字的创制推行概况作一简略的说明,是供一般读者参考的。现存八思巴字文物,我们没有全部收入,也在绪论中作一概括的介绍。作为本书主体的,自然是第二部分的资料。我们对这些资料曾作过一些简单的说明和考订,也附在这里供参考。无论是绪论或资料说明,都是几年前的旧稿,1952年就已排印付型了。现在看来,有些地方已不能满意,但一时亦难于作较大的修改。好在这都只是参考性质,不当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我们本来打算依据这些资料,校订《蒙古字韵》一书并和《韵会举要》相互对比,作一些语言学上的研究。拖了几年,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现在,我们把这些已收集到的不完备的资料整理编印出来,供历史语言学者大家利用。我们相信,这样做会更便于促进这一工作的展开。

编者

1958年5月

目 录

增订本说明	(1)
初版前言	(1)
 第一编 绪论	(1)
一 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文字	(3)
二 八思巴蒙古字的创制及推行	(8)
三 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文物	(14)
第二编 资料	(27)
一 碑刻	(30)
北京大学文研所所藏八思巴字碑拓简目	(30)
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拓本	(34)
二 事林广记百家姓	(62)
元至元郑氏刊本事林广记百家姓跋	(62)
元顺帝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刊本	(76)
日本元禄十二年复刻元泰定二年刊本	(86)
元文宗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刊本	(99)
元刊别本	(111)
三 蒙古字韵	(116)
蒙古字韵跋	(116)
关于蒙古字韵	(119)
写本蒙古字韵	(123)
蒙古字韵校勘记	(159)
第三编 音韵	(165)
一 字母	(167)
二 音韵	(170)

三 八思巴字和古官话(龙果夫原著).....	(181)
第四编 字汇	(221)
后 记	(265)

第一编 绪论

一 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文字

古代蒙古人的记事方法◎塔塔统阿的以畏兀字写蒙语◎印章制度的传入与授字的关系◎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各种文字◎八思巴造字的因素

古代的蒙古民族本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最初，也和古代的其他很多民族一样，用刻木结草等方法记事。当时去过蒙古的几个汉人，都曾提到过这件事。赵珙：《蒙鞑备录》^①：

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说郭本作止）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

《长春真人西游记》上^②：

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③：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此小木即古木契也。

没有去过蒙古的宋人，也有谈到这事的。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

鞑鞬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

1206年成吉思汗灭乃蛮(Naiman)后，擒获太阳汗傅塔塔统阿(Tatatunga)，曾叫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古代的维吾尔)字写蒙语。《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斡可汗尊之

① 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本)页三上。案原书题孟珙撰，今据王国维考证改过。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上(王国维校注《蒙古史料四种》本)页二十二下。

③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本)页九下至上。

为傅,掌其金印及钱穀。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大斡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穀,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关于古代畏兀字与叙利亚文的关系及其创制、流变诸问题,这里暂不详论^①。上引的这段史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塔塔统阿所教的是“书国言”(蒙语)的“畏兀字”。这种蒙古畏兀字的遗物,现在仍存有很多。其中要以苏联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院所藏的1220年至1225年顷的所谓“成吉思汗石”为最古。法国巴黎国档库所保存的1289年波斯阿鲁浑汗同1305年完者都汗给法国国王Philippe le Bel的两封信也都是用这种蒙古畏兀字写的^②。聂伯河(Р. Днепр)畔出土有畏兀字的蒙古银牌。近世更时常发现这种文字的碑刻^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收藏有此类蒙古畏兀字碑拓多种。从现存的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塔塔统阿对蒙古人的主要功绩,无疑是在于能应用畏兀字来拼写蒙古语言,创造了当时迫切需要的文字。虽然蒙古语中的若干语音在那时还不能完全译写清楚,但在那个时代,对蒙古民族说来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而且,它的优点,确还是多于缺点,在不断的发展与改革之后终于流传下来,直到今日。塔塔统阿所教授蒙古皇子诸王“书国言”的畏兀字,也就成为今天仍在使用的蒙文的起源。但近世邵远平作《元史类编》柯绍忞作《新元史·塔塔统阿传》^④,竟自忽略了这一点,而把《元史》原文里的“国言”二字删去,改成“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此据邵书,柯书作教诸皇子)。这便与原来的史实及其重要的意义都不相合了^⑤。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塔塔统阿与造字有关的另一贡献,就是给蒙古人介绍来印章的制度。成吉思汗所用的印玺,现在虽已不存,但想必也是用的古畏兀字。彭大雅

① 可参考 J. Von Klaproth, *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Berlin, 1812; P.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 *Asia Major*, 卷二 1925。

② Roland Bonaparte, *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Paris, 1895. 图版十四有此二信图影。

③ 参看格鲁赛(René Grousset),《蒙古史略》(冯承钧译本)一卷六节及三卷六节。

④ 柯绍忞《新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遂命教诸皇子以畏兀儿字书。”

⑤ 《元史类编·塔塔统阿传》,Abel Rémusat 曾有译文,多桑《蒙古史》第一卷沿袭其误,《类编》此误曾由伯希和(P. Pelliot)在《土耳其斯坦评注》中指正。(T. P. 1930)。又李德启著《满洲文字之起源及其演变》(见前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期)引据《新元史·塔塔统阿传》,未加辩证,殆亦为其所误。

《黑鞑事略》在记载蒙人使用“回回字”后,接着写道^①:

其印曰“宣命之宝”,字文叠篆,而方径三寸有奇。镇海掌之。无封押以为之防,事无巨细须伪首自决。楚材、重山、镇海同握鞑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鞑主之命,而生杀予夺之权已移于弄印者之手。

徐霆在《疏证》里说:

霆尝考之:只是见之文书者,则楚材、镇海得以行其私意,盖鞑主不识字也。

若行军用师等大事,只鞑主自断,又却与其亲骨肉谋之,汉儿及他人不与也。

可见直到蒙古窝阔台汗(Ogödei)(太宗)的时代,这种印玺还只是由耶律楚材和田镇海分别掌管,用来处理汉人和“色目”的军事以外的一些事情,蒙古皇帝自己还不能看当时的文书,因而曾产生一些流弊。成吉思汗之命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写蒙语,恐与此不无关系。《塔塔统阿传》中“始用印章”和“教太子诸王”两者记事的先后,也颇可玩味。“宣命之宝”的印,现在不能见到,无法详知。当时耶律楚材所掌者也可能是用汉字,镇海所掌者则必是古畏兀字无疑。蒙古太宗下一代的皇帝定宗贵由(Güyük)曾写给罗马教皇 Innocent IV 一封信,这信上所盖的印就正是写蒙语的古畏兀字^②,这是我们现存文物中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又《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中统三年(1262)……三月,壬午始以畏吾字书给驿玺书。

这是在八思巴字颁行的五年多以前,元人仍然在使用着畏兀字的印玺。

另外,在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之后八思巴字颁行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有人曾笼统的认为只有畏兀字,且已被普遍应用,故八思巴字不能流传后世。但假如我们根据史料,详加探究,则事实并不尽如此。

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西游记》里,记当时仍有刻木之俗,已如上述,而当他和成吉思汗谈话时,虽然有译者作翻译,但成吉思汗的左右仍以汉字记之。据前人考证,这种以汉字记录的谈话,至少有两次^③。又《蒙鞑备录》里说:

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说郛》本作“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

这里所说的如中国笛谱字的回鹘字当就是畏兀字^④。当时蒙古统治者横跨东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必须和很多国家、很多不同语言系统并使用不同文字的民族发生

① 《黑鞑事略》(前引书)页十。

② 见 P.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Paris, 1923. 原信附十二页后,贵由的玺附二十二页后。

③ 参看伯希和(P. Pelliot):《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原刊 1929《通报》,中译本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

④ 按“回鹘”此处即“畏兀”(Uighur)之异译。

交涉。根据上面的这段记载,可知当时的文书,行于西域诸国的用畏兀字,行于东方金国的则用汉字。而这两种文字,蒙古皇帝是都不认识的(见前)。彭大雅《黑鞑事略》也曾说到这种畏兀字^①:

其事书之以木杖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篆,如曲谱五凡工尺,回回字^②,殆兄弟也。

徐霆对这段文字,加以补充说: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中略,见前)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刺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由镇海,亦可互相检柅也。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效通事,便随鞑人行打,恣作威福,讨得撒花,讨得物事吃。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徐霆随使蒙古,已在蒙古窝阔台汗(太宗)的七八年间,当时行于汉人的仍用汉字,只行于回回(“色目”)者才用回回字(畏兀字)。“燕京市学”的某些人虽然已在教这种字,但蒙古人本族却还在使用“小木”。可见塔塔统阿所教的,只是“太子诸王”等蒙古统治阶级贵族中的极少数人,一般的蒙古人民则仍然在应用着原来的刻木记事的方法。

据上所述,可知塔塔统阿以后,八思巴以前,蒙古民族并不是统一和普遍地在使用着畏兀字,他们当时所使用的文字是极其复杂紊乱的。蒙古人民自己中间仍然保存着刻木结草的古法,而与其他民族之间则使用着畏兀字、汉字。这种语言文字上的不统一的现象,在蒙古民族兴起初期因为蒙古统治者不能全面掌握,管理文书的人玩弄权柄,便产生了很多流弊。忽必烈进占汉地建立元朝以后,汉族人民成为主要的统治对象,这时除了蒙古人民与蒙古统治者的矛盾外,广大的汉族人民与蒙古统治者中间,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成为元代社会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此外,原有的汉人地主阶级和新的蒙古统治者间一面互相依附互相勾结,而另一面,彼此间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仍然是严重地存在着,时隐时现。在这种复杂的新的情况下,蒙古统治者便迫切地要求一种新文字以便通过这种文字工具更直接地、有效地掌握政权,巩固地位,以统治蒙、汉各族人民。因此,他们所要求的新文字,就不只是

① 《黑鞑事略》(前引书)页九下。

② “回回”一词,元时或指色目人或指“畏兀”(古维吾尔)族,此处证以上下文及镇海之出身,当指“畏兀”无疑。

要能拼写蒙语,而还要能拼写其他民族的语言,首先是汉民族的语言。很显然,两种以上的不同系统的语言,在当时如果要用一种文字来同时兼顾,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但在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之下,八思巴为他们担负并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创制了拼写蒙、汉等民族语言的所谓八思巴蒙古字,并在一定的范围内行用了。

二 八思巴蒙古字的创制及推行

八思巴蒙古字的创制◎颁行时的用意◎推行八思巴字的几项具体办法◎推行期间的实况

关于八思巴蒙古字的创制,《元史·释老传·八思巴传》说:

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

八思巴是西藏萨迦派佛教的第五祖,十岁时出家,法名慧幢。癸丑(1253)年,他15岁,“谒世祖于潜邸”。戊午(1258)年,蒙古宪宗命释道订正《化胡经》,八思巴与道者驳辩,“剖析是非”道者辞屈,道教从此一蹶不振。中统元年(1260),被尊为国师,受命制蒙古新字当是同时或稍后的第一个任务。据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王磐《八思巴行状》:

庚申,师年二十二岁,世祖皇帝登极,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辞帝西归,未期月,召还。

八思巴在中统元年十二月被尊为国师并受命制字之后,随即返藏。此行一方面为了在政治宗教各方面做一些安排,并建黄金塔;另一方面也可能就已为造字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搜集和研究一些佛经中关于字母音韵等的著述,与喇嘛中专研这方面的人做一些讨论等等。这一点虽然尚无明白的记录(西藏现存史料将来如能利用或可有所发现),但与其不妥当的否认《元史·释老传》中统元年受命制字的纪事,倒不如这样解释更为合理^①。若然,则后来八思巴字母之所以由梵藏字母演化而出,也与此不无关系。

新字正式颁行的年代,《元史·释老传》说是至元六年(1269),《元史》卷六《世祖纪》三更有详细的记载说:

至元六年……二月……己丑,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

^① 《元史》卷二百三《方技传·阿尼哥传》有中统元年八合斯巴在西藏建塔的纪事,这大概是中统二年的事,因为元年十二月受命后才返藏,在当年是不能到的。

把这条史料与《释老传》互证,其年月当无问题。前引王磐的《八思巴行状》把制字、字成、颁行、升号、西归诸事记在一起,联于至元七年句下。这年所指的,主要当是西归,并不是在这一年颁行新字。

新字正式颁行时,蒙古皇帝曾为此下了一个诏书。《元史·释老传》把它全部录入:

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①

这个诏书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译写一切文字”这句话。有人因受到材料上的限制,曾误以为这种字只是古代的蒙文,只用来写蒙语,仅初期曾译写汉语,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我们现在不单是还保存着八思巴字写蒙语的很多史料,并且有元一代自世祖忽必烈至顺帝帖睦尔历朝译写汉语的八思巴字史料,也非常丰富。此外,现存史料中也还有一些是用八思巴字来译写梵语、藏语等佛教经典的。可见当时八思巴字的应用,确实如颁行诏中所说“译写一切文字”,这只要结合现存史料把这句话细加玩味,便很容易明了^②。

当时推行这种文字的主要办法,就是由朝廷先硬性规定“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但又恐一时不见得都能认识,所以“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在诏书颁布之后,为了推行这种“蒙古新字”,先在各路设立蒙古字学。《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至元六年……七月,己巳,立诸路蒙古字学。

同书卷七《世祖纪》四:

至元七年……夏四月壬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

另一方面,更具体的规定各种官方文书,必须用这种所谓“国字”。《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至元七年……冬十月,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

又《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学校条载有至元八年正月圣旨一通,甚为重要,今录出如下:

① 这个诏书《元典章》卷一诏令条也已载入,但中间有一句略有不同,即:“因取模楷及卫兀字以达本朝之言。”“卫兀”,“畏兀”同名异译,自不待言。此处的“模楷”曾有人以为是指以前的“刻木为契”但刻木只可记事并不能“达本朝之言”,而且我们前节已经证明当时确亦借用过汉字,所以我们觉得传本《典章》里的“模楷”当是“汉楷”之误,仍当以《元史》为准。日本羽田亨曾有此说,是。

② 参看蔡美彪:《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三号)。